

溇勺水·於(乌)越城·义乌市

冯志来

义乌有许多地名,值得作些考证,比如越城桥,旧志载:在城北二十里。这个地名乍看起来也没有什么,但是它却提出了一个问题:义乌是故越城吗?

明朝末年义乌县令进士熊人霖在湖清门诗中曾回答说:“西北高楼雄故都”,是说湖清门西北的高楼,即50年代初还存在的大成殿和城隍庙,这些高楼增添了故都的雄伟气氛。所以他认为义乌是故都,这样和越城桥的地名连起来,说义乌本是故越城就比较有了依据。

一、“溇勺”和“於越”

说故越城在义乌,可以先研究《山海经》。这部书相传在四、五千年前,由跟随大禹治水的伯益等人,考察了山山水水之后编纂而成,是我国最古的地理书。所载的南次二经就是记载吴越一带的山水。其中讲到柜山就是巨州以西,江西以东怀玉山一带。具区湖就是太湖。列涂水就是今富春江。溇水就是新安江。祝其县应该就是诸暨县。而溇勺山应该是现今的大盘山了,山中溇水(溇水者旁出之水也)向东流入大海,即指今之灵江源。溇勺水,它源于溇勺山西北,即是秦汉时的乌伤溪,也就是后来的东阳江,即今之婺江。

“溇勺”,有古越语的特点,和现在义乌土话(越语)“乌上”可说同音,那末这又是什么意思呢?

贺循《会稽记》云:“少康其少子号曰

‘於越’,越国之称始此。”义乌旧志亦说义乌“夏商周属於越”。

於越的“於”就是今文“乌”字。穆天子传中有“於雀与处”的记载,也就是“乌雀与处”。古人崇拜乌鸦,认为“乌”是太阳神。认为日中有乌,月中有兔。所以称日月为乌兔。另外《山海经》也有“金乌载日”之说。所以少康封其庶子为“於越”,不是毫无意义的。其含义应该是乌鸦飞起的地方,也就是太阳升起的地方,因为越地东临东海。“於越”是否指太阳升起的地方,从少康封庶子“於越”号“无余”来佐证。“无余”是什么意思呢?《史记·历书》载:“其岁甲子朔旦,日月合于牵牛之初,余分皆尽,故无大小余。”所以“无余”是一个天文历法的概念,是指甲子朔旦,日月相合的时候,所谓“日月成,故明也”。这样其地称“於越”其人号“无余”就是夏少康的良苦用心,就是叫他的儿子住在太阳出来的地方,在天明日月代兴之时,无大余无少余,而顺至正统。

研究了“於越”的含义,再来看“溇勺”,“溇”同“於”(乌)音近,而“勺”义乌土话 shǎ 和“上” shǎ 同音,原来“溇勺”就是“乌上”,也就是太阳上来的地方和“於越”太阳升越同义。这些都是古人对乌和太阳的崇拜相联系的。

二、会稽山和故越城

谈到会稽山,现在人们把它和绍兴连在

一起,《浙江通志稿》认定会稽山在绍兴、上虞、嵊县、东阳、义乌、诸暨六县之间。会稽是绍兴的郡名由来以久,主要是勾践灭吴称霸,迁都山阴,后长期以来又曾为会稽郡驻地所形成。但勾践父亲允常之时,越都还在诸暨,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。而夏朝会稽山和故越城究竟何在?又当另有所指。

首先《山海经》载:“会稽之山,四方。”“勺水出焉,而南流注于溟。”这里指明山的形态,指明水名和水流的方向。这都和绍兴诸暨之会稽山和浦阳江、曹娥江流向不相符合,只有“溟勺”水,今义乌境内之水南流。所谓勺水,应即是溟勺水,至今义乌还有上(勺)溪的水名。而今义乌夏演乡,也有人称夏堰、夏沿(峴),其中有大方山等山名,附近有“夏迹塘”,有“覆釜山”等地名,还有子城畈、子城庙等名称。《吴越春秋》称覆釜山下有禹庙,庙有圣姑像。这些记载都十分相符。那末大禹东巡计功在这里的可能性是很大的。因为古代海浸以后,今之宁绍平原沦为泽国,包括今之萧山、诸暨部分地区都还是沼泽滩地,当时所谓“鸟夷”族向山地转移,使今之金衢盆地成为最繁荣的地区,成为东南靠海最近的人类活动之中心,所以《越绝书》载:“无余都会稽山南,故越城是也。”《吴越春秋》也说:勾践语范蠡曰:“先君无余,国在南山之阳,社稷宗庙在湖之南。”

今之义乌正处在诸暨之会稽山南,是符合古籍记载的。另外《水经注》还谈到会稽“山南有礁峴,‘峴里’有大城,越王无余之旧都也”。礁山即今之稠山,而且用峴字命名的地方,这一带还很多,如峴溪、曲峴、上峴,东阳有东峴峰西峴峰;尤其是义乌城郊木峴山,出土了西周原始青瓷一百件,陶器及其他器物十四件,为全国他处所未见。另外,义乌出土了许多新石器时代的石斧、石镞、石刀、石镞,还有属于良渚文化的钺、璧、琮、璜等玉器。还有更古的恐龙蛋化石。皆足以证明上古义乌一带的文化已相当进

步。至于《水经注》把礁峴列在“会稽”条目之下,一则其时义乌属于会稽管辖,二则文字记载不甚分明,故有南辕北辙之误。

三、乌伤县名之谜

从《山海经》中的溟勺山、溟勺水到秦汉时乌伤县、乌伤溪,中间大约隔了二千年,虽然一脉相承,但由于沧海桑田,形势变幻,政治交替,经济衰微,本来路人皆知的事,也成为谜团。

义乌在秦嬴政二十五年建县,名为“乌伤”,所属地域包括今金华地区大部和仙居缙云一小部分。乌伤这地名的由来一说:出于南朝宋刘敬叔所撰之《异苑》文曰:“东阳颜乌以淳孝著闻,后有群鸟助衔土块为坟,乌口皆伤,一境以为颜乌至孝,故致慈乌,欲令孝声远闻,又名其县曰乌伤矣。”文中称东阳颜乌,而东阳立郡是三国时吴宝鼎元年(216),与乌伤县建于秦王政二十五年(前222)有矛盾。所以有人怀疑义乌县不是秦时所建而是汉县。现在说明了乌伤乃古溟勺即“乌上”衍化而来,这个谜团可不解自破。

那末,秦时为何将故越城改名为乌伤县而不称“乌上”县或“於越”县呢?因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郡县制之时,做的是“皇帝奋威,并诸侯,堕坏城郭”的事,考虑到征服诸侯以后如何巩固其大一统的权威。所以绍兴也不称於越而称山阴县,义乌是於越故城,决不允许继续存在。因为秦始皇建郡县,诸侯旧城郭被夷为平地,是一种政治行为,那么有一千五百多年历史的“於越”故城,对秦政权来说也是眼中钉,何况於越号称金乌(日)升越的地方,太阳又属火,而秦尚水德,水火岂能相容,所以建县就把於越旧王城,改名乌伤,使越族的太阳受伤沉没,不再有复兴的希望,也包含以水灭火之义。至今义乌民间尚有秦始皇要将义乌抄成“白”地的传说。而且《太平广记》博物篇

胡综转载：“昔秦始皇东游，以金陵有天子气，乃改县名，并掘凿江湖，平诸山阜，处处辄埋宝物，以当王气。事见于秦记。”可见这个说法是有文字依据的。不过故於越城本已日渐衰落，越国的中心，允常时已转移到诸暨，后经过吴越之战，勾践又转移到山阴，到秦建县后，起名“乌伤”，“於越”故城的名字也被抹掉了，自此人们心目中只有山阴、会稽、没有“於越”了，到了三国以后，长山等八县各自独立，义乌成为东阳郡或婺州下面一个县。

而“乌伤”这个县名，历来受到人们的抵制，所以王莽曾改名乌孝，“孝感群鸟”的故事，很可能是王莽时编造。王莽失败又复为乌伤，到唐时又有人认为不吉利，改名义乌一直沿续至今。

综上所述，义乌是故越城，应该是符合历史的。而且根据林华东研究（见《浙江学刊》1984年第1期）越族有鸟图腾之崇拜。禹时有“麒麟步于庭、百鸟佃于津”的神话，无余受封时有“鸟田之利”等等都说明这个问题，张崇根也认为长江以南有一支以鸟为图腾的部族，为越人的一支，似无疑问。这都说明鸟文化之久远。而今以鸟命名延续数千年的在越地只有义乌了。这也充分说明义乌历史之久远。所以可以说义乌是古越的母地，淳勺水是古越的源头。无怪乎明末学问家熊人霖发出“包吴络楚天王地”的感叹（见熊人霖通惠门诗）！

（作者系浙江省义乌市政协副主席 邮编：322000）

浅谈香港与内地普通话的推广与文化沟通的同步问题

许红珍

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以后，香港与内地的联系活动日趋频繁。21世纪的中国，内地需要香港的国际经济贸易中心城市的独特地位拓展海外市场，而内地巨大的人才市场、劳务市场、资源市场、销售市场，则为香港经济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极其广阔的发展机遇。人际交往活动，离不开语言交际。目前，香港和内地所普遍使用的语言有较大的差别。香港以粤语和英语为主，内地通行普通话。这样香港公民在内地活动，如果以粤语作为语言交际工具，只能局限于内地南方沿海地区；如果以英语作为语言交际工具，只能局限于外资公司。这将严重制约香港与内地的交往。因此，香港公民在与内地的活动中掌握、使用普通话，对于熟悉内地

环境，扩大在内地的活动范围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然而，对于香港来说，普通话与粤语的差别并非仅仅在于语音和词汇，更重要的是在于深层的文化方面的差异，普通话代表着一种特定的文化体系。

从大的文化根源来说，内地和香港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一脉所系，因此，大量的语言现象是有共同的语言特征的。虽然从近代以来百年的历史变迁使两地的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差异，但是，大量的语言现象对双方都没有理解的障碍，如香港叫做“计程车”的，内地叫做“出租车”；香港叫做“巴士”的，内地叫做“公共汽车”。即使普通话中许多产生于内地的词语，这些词语可